

吉野作造在五四時期的對華文化交流

黃 自 進*

摘 要

吉野作造（1878～1933）是戰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以研究中國革命史，西洋政治史及明治政治史而著名，也以鼓吹民主政治，提倡全民選舉而被時人譽為「大正民主運動的理論先驅」。

促成吉野推動中日文化交流的兩大要因，一是威爾遜主義在全世界的興起，二是五四運動的發生。威爾遜主義在全世界所掀起的民主浪潮，使吉野深信民主政治已成為當代政治思潮的主流，日本立國的方針應定位於對內勵行民主政治，對外推展國際民主政治。五四運動在中國的發生，證實了威爾遜主義已在中國萌芽，使吉野欣見中國學子追求政治民主之餘，更加深了他推展國際民主政治的信念。北京大學遊日團的訪日，成為他推動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步。他期待藉由雙方學術界及年輕學子們的互訪，能使雙方改革派勢力建立一個相互提携，互謀兩國民主化的友好關係。

日本政府的明文禁止雙方的文化交流，是吉野計畫功敗垂成的外在因素之一，但雙方的交流沒有共識的基礎，才是問題的核心。換言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既然是當時中國學運的具體目標，而吉野所培養的新人會卻對此毫無反省，在日本改革派不認同中國民眾的反帝國主義思想的情況下，雙方已喪失合作的基礎，這才是吉野推動中日文化交流失敗的主要原因。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吉野作造在五四時期的對華文化交流

黃 自 進

- 一、前 言
- 二、威爾遜主義影響下的中日情勢
- 三、吉野推動中日交流的肇因
- 四、中日交流的曙光
- 五、吉野的挫敗及影響
- 六、結 論

一、前 言

吉野作造 (1878~1933) ① 是戰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以研究中國革命史、西洋政治史及明治政治史而著名，也以鼓吹民主政治、提倡全民選舉而享有聲譽，被時人稱為「大正民主運動的理論先驅」。大正時期 (1912~1926) 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政治社會全面爭取民主平等的萌芽時期，它的主要精神是向舊秩序挑戰，並謀求社會多元化。吉野在這個時期開風氣之先，以啟蒙者身分活躍於輿論界。

① 吉野作造生於 1878 年，日本宮城縣古川市人。1904 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學科，奠定了他往後在日本學術界發展的基礎。同年進入母校研究所，繼續深造。1906 年在母校師長梅謙次郎的介紹下，到中國擔任袁克定的家庭教師，這是他與中國發生淵源的開始。1909 年應母校東京帝大之聘回國任職。1910 年奉派到歐洲留學。1913 年學成歸國，仍回母校擔任教職。1914 年因同僚寺尾享懇請，參與專門培養中國革命黨幹部「政法學校」的教學工作，這使他有許多機會與革命志士來往，其中也包括孫中山。1916 年年初，他著手撰寫中國革命史，介紹革命黨的理想。吉野以其本身的學術基礎，再加上與中國南北政要都會有接觸，因而他的中國研究，頗有獨到之處。同年 1 月，他發表「試論憲政之本義及達成憲政目的的途徑」一文，展開他在日本鼓吹民主運動的生涯。往後的歲月，世人鑑於他對推展日本民主運動的貢獻，稱譽他為「大正民主運動的理論先驅」。1924 年 1 月，辭東京帝大教職，入朝日新聞社擔任主筆，旋即因言行觸犯日本政府當局，被迫去職。同年 7 月，仍回母校東京帝大任教。1926 年，參與「社會民眾黨」的組黨工作，期待新政黨的成立，促進日本政治的民主化。但不料一手所培養的政黨，竟為擴張黨勢而犧牲建黨理念，採用與右翼軍人合作的政策。為此，吉野與社會民眾黨劃清界線。1932 年發表「民族與階級與戰爭」一文，除了力關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之不當外，也抨擊社會民眾黨坐視政府侵華政策的不義。翌年，逝世於神奈川縣。

尤其是大正中期以後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勞工運動，以及大正末期相繼而起的新興政黨，例如社會民眾黨等，都與他淵源深厚。^②因此他的言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吉野是威爾遜主義的信徒，深信二十世紀是國際民主政治來臨的時代。基於此一信念，再加以五四運動在中國的發生，使他欣見中國學子追求政治民主之餘，更加深了他對兩國民主化的過程中有互動關係的認同。因此，他在五四運動時期，積極推動中日文化交流，認為兩國有志於推展民主運動的知識份子應加強連繫，建立相互支援，共謀兩國民主化的友好關係。戰後以來，研究五四時期吉野與中國關係的論著，不勝枚舉。但基本的研究方向，都偏重於介紹吉野對五四運動的評價^③以及他推動中日文化交流的部分史實，^④專門分析他推動中日文化交流的思想背景以及此等交流的成敗所意味的時代意義的著作，則仍屬欠缺。本文有鑑於此，遂將研究焦點專置於探討此一層面，並循當時中日雙方交流的狀況、日本政治思潮的演變等線索，探討吉野推動中日文化交流計畫功敗垂成的前因後果，及其失敗所象徵的時代意義。至於吉野與中國革命運動的淵源，以及他對日本侵華政策評價的前後不一等有關他個人政治理念演變的課題，作者已另有專文探討，於此不再贅述。^⑤

二、威爾遜主義影響下的中日情勢

自 1918 年 1 月 8 日美國總統威爾遜宣布媾和十四點原則^⑥以來，中國朝野對

② 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とその後（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年），頁24-42，155-156。

③ 針對日本與五四運動的關係而論及到吉野觀點的論文有林明德，「日本與五四」，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社，民國68年），頁100-101，108；野原四郎，「五四運動と日本人」，中國研究紀要，第2號（1963年10月），頁89-95，111-116；嶋本信子，「五四運動と日本人：同時代の反應と研究史」，史潮，1967年第100號，頁224-225。針對吉野的五四運動觀而撰寫的論文有拙文，「吉野作造と中國：五四運動を中心に」，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論文集，第22號（1985年），頁81-100。探討吉野與五四運動的關係而收錄於專刊者有松尾尊兪，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研究（東京，青木書店，1966年），頁292-306；三谷太一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吉野作造の時代とその後，頁193-194。

④ 松尾尊兪，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研究，頁297-306。中村勝範・酒井正文，「『先驅』時代の新人會の活動」，法學研究（1981年6月號），頁44-45。

⑤ 吉野早期對中國革命一直持反對態度，1915~1916年護國軍起義討袁，吉野着手研究中國革命史，對革命的態度遂逐漸改變，由反對轉為同情，從此就一直以親革命黨人自居，不時發表時論批評日本對華政策的不當，可謂日本戰前親華派的輿論代表。詳情請參閱拙文，「吉野作造對中國革命的認識與態度的轉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91年6月），頁237-257。又參閱拙文「吉野作造對孫中山的認識與評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期（1992年6月），頁601-619。

⑥ 劉彥，歐戰期間中日交涉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62年），頁194-199。

戰後的國際社會和平十分殷切地寄予期待。如知識份子對戰後新秩序的極力建言，北京地區民眾的熱情狂歡慶祝協約國勝利日，^⑦以及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所負的外交使命等等事實，無一不是反映當時中國朝野對戰後新秩序的憧憬。

知識份子對威爾遜和平媾和原則的共鳴，當然與中國的處境有關。1915年中國在武力脅迫下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在喪權辱國之恨深植人心之際，如何尋求國際的支持以抗衡日本的侵略，一直也是中國知識份子關心的課題。再加以當時執政的段祺瑞政府無視民心的向背，公然倒行逆施，認賊做父。以參戰為名出賣利權為實，換取日本大量經援，在國內厲行專制升高內戰的作風，不僅加深了知識份子對專制政治的痛恨，亦讓知識份子對專制政治與帝國主義之間具有連帶關係之事實，有更進一步的體認。在此情況下，對中國知識份子而言，威爾遜所倡導的民族自決，尊重小國政治獨立、廢除秘密外交等主張，不僅有助於中國擺脫被侵略的命運，也有助於中國營造一個推展民主政治的環境。

以五四時期，領政論雜誌風騷地位的「每週評論」的創刊辭為例，陳獨秀就是基於上述的體認，認為威爾遜主義的宗旨，是在「主張公理，反對強權」，也就是說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⑧以這說法，印證於中國現勢，無疑的，其一是反對日本侵略，其二是抨擊段氏政權的專制。此外，領導全國學術界風氣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戰後國際新秩序觀，則又是一明顯的例證。蔡氏認為以威爾遜主義為戰爭目標的協約國的勝利，意味著國際間一切不平等黑暗主義都將消滅。今後將是黑暗的強權論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武斷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揚的時代即將來臨。從蔡元培的立論中，也可得知其對威爾遜主義的期待，不侷限於爭取中國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更著眼於中國能在威氏所帶動的民主大潮流中，從善如流成為一個民主國家。^⑨另外，例如李大釗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就是意味著民主主義的戰勝，象徵著庶民的勝利。^⑩這些論調無異都是當時中國知識份子在威爾遜主義的鼓舞下，對戰後世界新秩序所持樂觀態度的真實反映。在知識份子的熱誠鼓吹下，這種樂觀的氣息

⑦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全國學校放假三日，北京並於11月17日舉行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提燈遊行，滿街旌旗，鼓樂喧闐，歡呼入雲，高歌「雲消霧散，重見青天」。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頁517。

⑧ 陳獨秀，「發刊辭」，每週評論，第1號（民國7年12月22日），版1。

⑨ 蔡元培，「黑暗與光明的消長」，蔡元培，蔡元培選集。演說（臺北，文星書店，民國56年），頁70-74。

⑩ 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新青年，第5卷第5號（民國7年10月），頁437。

傳播至全國，並進而形成共識。全國上下都企求未來的巴黎和會是中國追求主權獨立平等的契機，也期待這是推動改革中國社會政治的起點。^①在全國都有共識的基礎下，北洋政府爲了順應輿論，塑造舉國一致的形象，除設置外交委員會統籌和會的事宜外，^②還特別網羅南方軍政府派赴美國代表王正廷爲列席和會的全權代表之一。^③當時中國代表團根據外交委員會的訓令，向和會提出的希望條件中，要求修改歷年來中國進入國際社會所遭受到的所有不平等待遇，包括廢除外國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隊巡警以及撤銷領事裁判權，恢復關稅自主權等重大項目。^④從這些要求中，也可看出北洋政府對和會的期許。換言之，唯有深信和會必能根據正義及無私原則處理中國問題的前提下，中國代表團才會提出如此錯綜複雜，牽扯各國在華權益的提案。從這角度來看，中國朝野對威爾遜所提倡的國際秩序所持的樂觀態度，基本上並無不同，都有過度期許的成份。

與中國上下一片交相讚賞相較，日本對威爾遜和平媾和十四點原則的反應就顯得複雜多了。例如，日本在野黨領袖犬養毅就認爲威爾遜的主張是對日本利益的挑戰，是一種完全漠視日本利益的看法。犬養毅強調在和會中日本是否能排除威爾遜的牽制，確保戰爭期間日本所占領的膠州灣及南洋原德國屬地等戰略要地，關係到日本海軍能否在太平洋海域上對抗美國海軍的關鍵所在；力陳確保膠州灣關係日本國防的安全，絕不可能有和威爾遜主張妥協之餘地。^⑤

而日本政府方面，則是「總論贊成，各案反對」。換言之，爲顧及國際輿論，日本對威爾遜主張予以表面上的肯定，但涉及具體個案時卻一一反駁。例如對廢除秘密外交的主張，日本雖然原則上表贊成，但又強調兩國在締約時，在不違反第三國權益以及國際信義的原則上，不應有公開的義務，對已簽訂的條約也不應公開。^⑥像這種表面贊成，實質反對的做法，無一不是反映在日本的對外政策。日本政府給予出席巴黎和會日本使節團的正式訓令，爲(1)確保日本在戰爭期間，在山東省以及赤道以北原南洋德屬地所掠奪而來的領土利益。(2)與日本無直接利益關係課題

① 胡適，「紀念五四」，陳少廷編，五四運動的回憶（臺北，百傑出版社，民國68年），頁10。

② 劉彥原著，李方晨增補，中國外交史（臺北，三民書局，民國51年），頁547。

③ 同註⑥，頁193。

④ 同註⑥，頁200-202。

⑤ 南洋原德國屬地是指赤道以北太平洋上的 Marshall, Mariana, Caroline 等島嶼。詳情請參閱拙文，「犬養毅の中國における日本の權益論：明治、大正期」，中村勝範編，近代日本政治の諸相（東京，慶應通信出版社，1989年），頁483-484。

⑥ 伊東已代治著，小林龍夫編，翠雨莊日記——臨時外交調查委員會會議筆記（原書房，1966年），頁285。

者，儘量避免涉入。(3)與他國有共同利益關係課題者，在細察大局走勢的前提下，儘量與他國採取同一步調。^⑰

從日本和會的對策，得知其所關心者僅止於戰爭期間所掠奪的戰利品是否取得大會承認，對其餘課題，則一律不加理睬，對威爾遜所號召的重整國際新秩序，更是敷衍了事。在日本這種既定政策下，中日兩國政府在和會上的對抗，已是不可避免。但當兩國政府代表在巴黎和會上唇槍舌戰針鋒相對之際，兩國民間的學術界卻一反常態，構築了另一交流的管道，雙方企求藉由知識份子相互造訪，增進雙方的瞭解，傳播兩國民間的親善友誼。日本方面的主事者是吉野作造以及和他淵源深厚的學術社團「黎明會」及學生團體「新人會」。而中國方面的負責人則是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以及他參與創建的「少年中國學會」。吉野作造與李大釗曾有師生之緣，因為 1907 年吉野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教授議會政治與地方自治的課程時，李大釗是其受業弟子。^⑱但促成兩人合作，願意為兩國民間親善而努力，則還是在於兩人有共同的思想信仰，那就是對威爾遜理想的共鳴。

李大釗對威爾遜理想的共鳴，其理由不難想像，因為他就似弱者仰慕主持正義的強者一般，有其道德面的激賞，也有現實利益的考慮。但身為掠奪國國民之一的吉野，為何有這見識，而與其祖國政府相左呢？個中情節則需從他個人理念及當時日本的政治環境加以探討。

日本自1890年開始實施議會政治。初期的選舉制度，對選舉資格有嚴格限制。唯有年滿二十五歲，每年直接納交國稅達十五元者，才可取得選舉資格。^⑲由於有財產資格的限制，實際能參與政權者僅限於地方的士紳階級以及都市的新興工商人士。以 1918 年為例，全日本五千三百萬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三即一百五十四萬人有選舉權。^⑳再加以明治政府主導立憲，引進議會政治時卻又高唱「超然主義」。意味主政者為求公正，必需超越黨派。^㉑根據此理，日本總理大臣的誕生自始就是決定於出身長州薩摩兩大派閥組成的元老會議，而非由議會的席次決定。日本的政權也自明治政府成立以來，絕大部分時期是由長州薩摩兩地區出身的官僚派系所掌

⑰ 同上，頁 284。

⑱ 同註②，頁 189。

⑲ 中村菊男，日本政治史讀本（東京，東洋經濟新報社，1978年），頁54。

⑳ 井出武三郎，吉野作造のその時代：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政治思想斷章（東京，日本評論社，1988年），頁24。

㉑ 同註⑲，頁54-55。

握。②

鑑於政治資源被少數人壟斷，國內政治結構又極端不合理的情況下，吉野於1916年1月，發表「試論憲政之本義及達成憲政目的的途徑」一文，展開他公開宣揚民主理念的生涯。依他的解釋，「德謨克拉西」(Democracy)一辭在政治法律學上包含兩種涵意：一是「國家的主權在法理上是屬於人民所有」；另一是「在政治意義的層面上，國家主權運作的目標是為了人民」。前者，吉野認為這是一種法學理論上的抽象理念，在君主立憲國推展有實際的困難。而後者主旨是強調「民享」的觀念，衡量的標準不在於探討主權的歸屬，而在於政治權力運作的最終目標是否為了人民福祉，政策決定的過程是否以民意為依歸。因此，後者的理念，不會被國家的原有體制所限制，在任何國家都有推展的可能性。吉野強調的「德謨克拉西」，就是指國家主權運作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增進人民福祉，因此他將其譯為「民本主義」。③

吉野的「民本主義」，因不涉及主權的歸屬，因此在天皇的體制下也有實施的可能性。換言之，吉野對「德謨克拉西」的重新詮釋，不僅提供日人在天皇體制下推展民主政治的理論基礎，也因為其尊重現行體制，迴避與天皇直接衝突，促成其免於被日本政府當局立即壓制的命運。④何況，當時的國內外環境也有助於他宣揚民主理念。就以國際環境方面而言，自從美國加入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目的就從傳統的國家利益戰爭一躍而成為「為民主主義而戰」。美國式的民主理念，生活方式也隨著美國參戰而廣為世人知曉。國內環境方面，因日本本身為協約國之一員，所以對協約國「為民主主義而戰」的口號，不得不表示尊重，此一尊重政策反映在日本國內的，就是一改往常強制鎮壓的政策，對民主主義在日本所造成的浪潮改採默認態度。⑤而吉野也就在這股浪潮的助陣下，一躍而成為當時日本輿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評論家，吉野也因此被時人譽為「大正時期民主運動的理論先驅」。

② 從1885年日本第一位總理誕生時起，到1916年1月吉野公開宣揚民主理念時止，總共有八位人士出任十七屆總理。其中除大隈重信及西園寺公望各出任二屆總理外，其餘皆是出身於長州、薩摩兩地區。

③ 1918年1月，他秉承前文，發表「再論憲政之本義及達成憲政目的的途徑」一文。在此論文，他對「民本主義」的定義做了部份修正。前一論文中他強調民本主義兩大要件，一是政治權力運作的最終目標是為人民福祉，另一是政策決定的過程應以民意為依歸。在這篇新作中，吉野保留第一項，把第二項修改為政策決定的過程應容納民眾普遍性的參與。明白揭示民眾應有參政權。吉野作造，民本主義論（東京，新紀元社，1947年），頁29-31，頁264-267。

④ 吉田千代，評傳鈴木文治：民主的勞使關係をめざして（東京，日本經濟評論社，1988年），頁138。

⑤ 同註②，頁25-28。

吉野在晚年的自敘中，自認「試論憲政之本義及達成憲政目的的途徑」一文，並沒有在民主理論的推廣上有特別建樹，但因配合時勢，以及提供在日本的特殊環境下推展民主政治的空間，因此能廣為時人所接受。^{②⑥}

他所提到的時勢，就是前文中所論及的威爾遜思想在日本國內所造成的風潮，以及日本政府顧慮到國際輿論的壓力，對國內民主思潮的發展，一反往日的高壓態度，而改採容忍政策的演變。

從以上的研究可知，大正民主運動的發展與威爾遜思想的盛行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外，也可理解到吉野在日本輿論界的崛起，部分因素是得力於威爾遜思潮所帶給日本的衝擊。而在此不能忽視的是，吉野所以能掌握潮流順勢而行的關鍵，還是在於他對威爾遜思想的欽服以及他在配合日本政治格局下對威爾遜思想所做的重新詮釋。

吉野對威爾遜的注目始於1916年12月，當威氏在美國正式參戰前的四個月，以仲裁者身份向交戰國雙方呼籲在「沒有勝利的和平」原則下進行媾和之時。吉野認為以往的戰後和平，不是起因於一方徹底屈服，就是雙方格於形勢無力再戰。但這種和平經事實證明都只是一時的妥協，不是根本解決之道。因為徹底屈服並不能保證戰敗者沒有復仇之心，普法戰爭所埋下的仇恨就是一例。而雙方格於形勢無力再戰的情況下所締結的和平，也不表示雙方已無再戰的準備，日俄戰爭即是一明顯例證。威爾遜所號召的「沒有勝利的和平」，雖然沒有具體內容，過於抽象，但這種打破以「力」來決定和平走向的傳統慣例，企圖以「說理的方式」重建國際和平新秩序的做法，吉野認為是政壇人士中的創舉，值得推崇。^{②⑦}

爾後，當威爾遜宣佈和平媾和原則，明確揭示其準備創建國際聯盟以維持國際和平信念之時，吉野特撰文讚揚。認為威氏的主張象徵著國際民主主義時代即將來臨，是人類社會自十九世紀發展民主政治以來，將國內民主法治的理念提升到國際社會領域的新里程碑。吉野特別指陳國際民主時代的來臨不僅意味著國際平等主義的確立，也意味著國內民本主義的徹底執行。因為唯有一個對國內自己同胞講求社會正義的社會，才可能將這種追求社會正義的精神昇華到對全世界其他族類的民眾也講求國際正義。換言之，沒有一個健全民主政治基礎的國家，不可能在國際社會

②⑥ 吉野作造，「民本主義鼓吹時代の回顧」，吉野作造，樞府と内閣他(東京，朝日新聞，1950年)，頁194-195, 213。

②⑦ 吉野作造，「帝國主義より國際民主主義へ」，太田野雅夫編，資料大正デモクラシー論争史上巻(東京，新泉社，1971年)，頁183-185。

上有追求自由、平等、正義的理念。在強調威爾遜的理念是在追求全面性的社會正義，沒有國內國際界線的同時，吉野也再三強調，威爾遜的理念已在國際間取得共識，已成為當代政治思潮的主流，面對此一趨勢的演進，身為文明國一員的日本，不應昧於形勢抗拒潮流，相反地應積極投入，應與世界榮辱與共，在追求日本進步的同時，也應為世界的發展盡力。^②

由於吉野對民主政治的信仰，以及對威爾遜思想的共鳴，使他深信日本對內應勵行民主政治，對外應推展國際民主政策。此不僅是順應世界潮流之舉，也是增進日本國家利益的不二法門。基於此一信念，使他在國內鼓吹民主政治之際，也不忘記在國際間尋找同道以謀共同推展國際民主主義。這份與世界文明共榮辱的執著，也是他日後與中國學者共同推展中日文化交流的原動力。

三、吉野推動中日交流的肇因

1919年5月中國發生五四運動。鑑於五四運動是因山東問題在巴黎和會交涉失敗而起，日本朝野都普遍認為這是單純的一種反日運動，^②但吉野卻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吉野認為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利只是引火線，促成五四運動發生的主因卻還需歸諸於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③並以北京大學新思潮的興起為題，^④來解析五四運動發展的來龍去脈。吉野強調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是兩大政治集團的武力對抗，也是兩大政治思潮角逐的戰場。協約國的勝利，除意味著軍國主義思想的敗北外，也象徵著民主思潮的全面性勝利。^⑤他更進一步分析，在民主思想因戰爭的勝利而成為世界潮流之際，中國也不免受其衝擊。曾在北京學界行之多年的「新文化運動」，能突然一躍成為中國改革的先鋒，在中國知識界掀起一股勇於向傳統挑戰，全面求新求進的變局，無疑的就是這股民主浪潮在中國引起共鳴的真實映像。而新文化運動既號召民主，又企求社會改革，在這種訴求下，支持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與阻擾中國進步的專制政治發生衝突，是一必然趨勢。^⑥換言之，吉野

② 同上，頁200。又參閱吉野作造，「世界の大主潮と其順應策及び對應策」，中央公論，1919年1月，頁142-146。

③ 拙文，「吉野作造と中國：五四運動を中心に」，頁87-88。

④ 吉野作造，「日支國民的親善確立の曙光」，解放，1919年8月，頁102。

⑤ 吉野作造，「北京大學に於ける新思潮の勃興」，中央公論，1919年6月，頁94-95。

⑥ 吉野作造，「世界の大主潮と其順應策及び對應策」，頁142-143。又參閱吉野作造，「山東問題解決の世界的背景」，中央公論1919年6月，頁88-90。吉野作造，「デモクラシーに關する吾人の見解」，黎明演講集第2輯（1919年4月），頁77-78。

⑦ 同註⑥。

認為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利，只是引爆雙方衝突的導火線，新文化運動的推展才是促成五四運動爆發的原動力。

既然吉野認為新文化運動是觸發五四運動的基本要因，當然，他對五四運動的理解也不會局限在運動過程中所呈現出的反日訴求。吉野認為五四運動除具有外交上的意義外，也有內政上的含意。五四運動有兩個目標，一是對抗外在的侵略主義；另一卻是排斥中國的專制政策。^⑭因此吉野強調五四運動也代表著青年學子追求民主政治化的熱忱。

因此，吉野呼籲中日親善之道莫過於加強民間的交流。對五四運動中凸顯出的反日情緒，吉野則歸咎於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不當。吉野認為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完全是以「利」字為重，這種過於熱衷追求日本在華利益的政策，導致日本政府自絕於中國國民，只能和那些能容忍日本政府要求，罔顧國家利益的官僚政客打交道。而這些所謂「親日派」的官僚政客，也正因有日本的支持，才得以苟延殘喘。這種惡性的循環，不僅阻礙中日之間的親善，也掀起了中國民間的反日熱潮。至於解救之道，首先必須求諸日本民眾的覺醒，發揮其牽制日本政府的力量。^⑮進而寄望日本改革勢力成功。唯有新興的日本，才有望於和鄰邦民眾建構真正的親善友好關係。^⑯

為消除日本民眾對五四運動的疑慮，吉野一再撰文解釋，指稱中國民眾的反日，肇因於日本政府支持北京軍閥官僚政府的不當，因此所有的責任在於實行侵略政策的日本政府，而非愛好和平的日本國民。因此，日本民眾不需憂慮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一旦中國民眾瞭解真象，理解到日本民眾和中國一樣，厭惡日本政府的侵華政策，同樣正為其本國的民主化與專制政府奮戰時，中國民眾必定樂意放棄全面性的抗日行動，與日本民眾攜手合作，一起為牽制日本政府的侵華政策而戰，一起為促進兩國的民主化而戰。^⑰

基於以上的信念，吉野認為當務之急，莫過於讓中國民眾瞭解日本國民的真意，兩國民間的有志人士，應儘早建立溝通的管道。吉野的初步構想是先邀請兩名學運領袖以及一名北京大學教授到日本訪問，以懇談會的方式，讓日本學界瞭解

^⑭ 吉野作造，「支那における排日事件」，中央公論，1919年7月，頁86。

^⑮ 吉野作造，「北京大學學生團の行動を漫罵する勿れ」，中央公論，1919年6月，卷首語。又參閱吉野作造，「支那排日の真因」，廓清，1919年8月，頁23-25。

^⑯ 吉野作造，「北京學生團の行動を漫罵する勿れ」，卷首語。

^⑰ 同註⑮，頁102-110。又參閱吉野作造，「北京學生團の行動を漫罵する勿れ」，卷首語。

五四運動之本質，也可向鄰邦友人表達日本民間對中日親善的期待。爾後，日本方面也遴選適當人士回訪中國。希望透過這些聯繫，來加強中日兩國知識界的合作關係。^⑳

1919年6月5日，五四運動發生後的一個月，吉野在黎明會的例行集會中，將此構想提交大會討論。經大會議決，決以吉野具名用黎明會的名義向北京大學李大釗發函邀請，請其全權負責斡旋此事。^㉑前文中曾提及吉野與李大釗有師生之誼，但為何吉野作造要用黎明會名義去函？此外，吉野選擇李為交涉對象，除上述的私人友誼外，是否還有其他考慮？個中情節，則需從黎明會性質以及當時吉野與李大釗的交往狀況加以探討。

黎明會成立於1918年12月，是一羣贊成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學術團體。成員四十人，以舉辦研討會及出版研討會專集為活動主要內容。^㉒當時吉野極力主張自由民主，撰文責難右翼國家主義團體，因此受到他們圍剿，黎明會成立的目的，一則為聲援吉野；一則為宣揚自由民主理念。^㉓因為黎明會的成員已深深體會到吉野個人的安危與日本國內是否能順利宣揚民主理念息息相關。因此，該會的成立，也意味著參與的會員都有遠大的理想、有共同的使命感以及相同的危機意識。

黎明會成立時，提揭出三大綱領：

- (1)將日本的國體，用學理加以闡明，並在世界人文發展的過程中，發揮日本獨特的使命。
- (2)消除不能順應世界情勢的危險頑冥思想。
- (3)順應戰後世界新趨勢，促進國民生活的安定與充實。^㉔

從這三大綱領，也可理解黎明會的活動領域，是限定在資訊的傳遞及民眾的教育啟發。批評時政雖然是他們的主要活動之一，但參與政治卻是他們所迴避的。^㉕論政而不參政，其主要的考慮，一在他們認為嚴守學術的超然立場，可專心致力於民主思想的啟蒙，另一方面也可避諱當局干預，免遭立即鎮壓的命運。因此黎明會對會員的吸收採嚴厲謹慎的態度，對社會主義運動者^㉖及非學術界人士採一律拒絕

^㉑ 同註[㉐]，頁102-105。又參閱，東京日日新聞，1919年8月13日。

^㉒ 同註[㉐]，頁105。

^㉓ 中村勝範，「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斷面：黎明會の研究」，慶應義塾創立一百二十五年紀念論文集：法學部政治關係，1983年10月，頁3-10。

^㉔ 中村勝範，「黎明會創立における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斷」，法學研究，1985年2月，頁10-17。

^㉕ 吉野作造，「開會の辭」，黎明演講集第1輯（1919年3月），頁1-10。

^㉖ 同上，頁13-16。

^㉗ 中村勝範，「黎明會とその漸進主義」，法學研究，1986年12月，頁73。

的方式。^{④⑤}

黎明會既然以傳播民主訊息為己任，又是吉野的精神堡壘。無論是愛護吉野之士，或者是關心日本民主政治發展者，當然也會對黎明會寄以關注。李大釗首在1919年2月16日刊出的每週評論中以「祝黎明會」為題，向國內讀者介紹黎明會的宗旨以及表達他個人對黎明會的期待。依李大釗的解釋，黎明會的宗旨就是「主張公理，反抗強權，打破資本主義、軍國主義，完成日本國民的共同生活，使他與世界人類的共同生活調和一致」。^{④⑥}而他所謂的共同生活就是指人類文明的發展。完成日本國民的共同生活之意義就是指提升日本文明的水準，與世界文明同步發展。李也強調中日兩國，本來有最親切的關係，只因兩國軍閥相互弄權，再加以狼狽為奸，讓兩國國民互相生活在不信賴猜忌之中。如今日本有志之士願為民主請命，可謂東亞漸露曙光，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兩國的政治發展本有互動關係，日本有黎明的曙光之時，中國也會如期不遠，今後兩國有志之士，應攜手同行。^{④⑦}

從前述中，可以察覺李大釗對黎明會宗旨的認同以及他個人也有意加強與日本有志於民主大業學者之間的聯繫。在同期的每週評論上，他又以「黎明日本之曙光」為題，以通訊題材的方式將同年1月18日黎明會第一次演講會的實況一一加以報導。同文中，他尊稱吉野作造為日本新派學者，稱讚黎明會的活動是「日本政治思想界的新曙光」。^{④⑧}

吉野也在1919年1月19日出刊的每週評論上，以來函方式感謝贈閱。同時，他在函中也對新成立的黎明會稍加介紹，並表示黎明會的講演紀實將於近日出刊，屆時必寄贈一部，而最後以「尚乞遙為聲援，不勝切盼」為結語。^{④⑨}從此函中可看出吉野對雙方關係的重視，並有加強聯繫相互聲援之意。

從以上論述中，得知五四運動以前，以吉野為首的黎明會及以李大釗為主幹的每週評論已有相當密切的來往。而雙方交流的基礎是建立在對威爾遜理想的共鳴，對民主政治的信仰。雙方對未來新世界秩序有相同的憧憬，並對兩國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有相同的體認。雙方的交往不僅有惺惺相惜，而且還有敵愾同仇之心。這種信心也是五四運動爆發以來，風起雲湧的反日浪潮在中國各地興起之際，支持吉野堅信中日民間仍有合作餘地的根據所在。

^{④⑤} 內山秀夫，「解題」，黎明會，黎明會講演集第1卷（東京，龍溪書舍，1990年），頁10-11。

^{④⑥} 李大釗，「祝黎明會」，每週評論，第9號（民國8年2月16日），版2。

^{④⑦} 同上，版2、3。

^{④⑧} 同註④⑥，版3。

^{④⑨} 吉野作造，「祝黎明會」，每週評論第5號（1919年1月19日），版4。

四、中日交流的曙光

1920年5月，北京大學教授高一涵率領北京大學學生遊日團訪問日本，團員有方豪、徐彥之、康白情、孟壽椿、黃日葵等五人，其中除方豪外，皆為少年中國學會的主幹。^⑤高一涵等人能够成行，意味著吉野推展中日民間交流的一大成就。從吉野推動此項交流，到高一涵等人順利成行，其間相距十一個月，個中種種曲折，無一不是反映當時的中日關係以及日本政治思潮的變化。

前文中已經提到，早在1919年6月，吉野就以黎明會名義懇請李大釗負責籌組北京學界及學運領袖訪問日本。不料李大釗的回信中，對吉野的邀請，避而不談，只提北京學界有意邀請吉野來華講學，為此，吉野頗感困惑，特委託其門生岡上守道（時在滿鐵任職），趁出差北京之便，當面與李大釗交涉。據岡上的回報，北京大學的年輕教授們，基本上對吉野的構想並不排斥，但鑑於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請辭不在校，不便立即應邀。不過李大釗深信蔡校長復職後就可迎刃而解。至於學運領袖訪日之事較有困難，因為學運領袖現都集中在上海，北京已找不到具代表性的領袖人物。再加以中日關係正值緊張之際，此時此刻誘導學生代表赴日倡導中日親善，不僅不易達到敦親睦鄰的目的，反而有瓜田李下之嫌，容易導致外界誤認學生領袖已被日方收買。^⑥

岡上的回報，使吉野理解到時機尚未成熟，不過他並不氣餒，仍秉持自己信念盡力而為。在知曉學運中心已移至上海後，他前後派遣三位「新人會」成員即他的得意弟子宫崎龍介^⑦、平貞藏、早阪二郎^⑧到上海、北京等地，希望藉由雙方學運領袖的接觸，建立兩國青年知識分子間的溝通管道。另一方面，他則在東京扮演魯仲連的角色，極力緩和中國留日學界與日本朝野的緊張對立情勢。1919年5月7日，東京留日學界與日本警察衝突所導致的日本排華，留日學界醞釀集體返國運動中吉野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明顯例證。

1919年5月7日，東京留日學界因商借中國駐日大使館做為紀念國恥日會場

-
- ⑤ 例如孟壽椿是學會的會計股主任，黃日葵是文牘股主任，徐彥之是交際股主任，康白情是少年中國的編輯。而此一團體在日本活動期間，也以少年中國學會代表的名義對外宣傳。少年中國，第1卷第11期（民國9年5月），頁57。又參閱少年中國，第3卷第2期（民國10年9月），頁74。
- ⑥ 同註②，頁105-108。
- ⑦ 大阪朝日新聞，1919年6月10日。又參閱宮崎龍介，「新裝の民國から」，解放，1919年12月，頁121-129。
- ⑧ 中村勝範，酒井正文，「『先驅』時代の新人會の活動」，頁44-45。又參閱伊藤隆，大正期「革新」派の成立（東京，塙書房，1978年），頁55-57。

不成，而羣集大使館前，要求大使館推翻不借場地的原意。不料，大使館卻請求日本警方出面干預。在日本大批警力及憲兵馬隊的強制驅離下，不僅雙方有激烈肢體衝突，還有十一名學生當場逮捕。^⑤由於當天是慶祝日本皇太子裕仁成人儀式的節日，此一衝突事件就在有心人士的挑撥下，被日本媒體渲染為是一種挑釁及仇日的舉動。^⑥被捕的十一名學生中有七名學生以違反治安警察法及妨害公務的罪名，分別處以三個月至十一個月不等的徒刑。^⑦激憤日本警察的暴行在先，痛恨日本司法不公在後，兩千餘名留日學生決定集體返國以示抗議。^⑧

對此情勢的發展，吉野頗感遺憾，認為這是親者痛，仇者快的行爲。爲此，他與內務大臣床次竹二郎、警保局長川村竹治、外務省政務局第一課長小村欣一等聯合，一面勸勉留日學生不要輕易放棄學業；另一方面，也發動輿論爲留日學生辯護，爲司法上訴再鋪路。^⑨依吉野的解釋，留學生羣集大使館前，是因先前大使館員一再阻擾留學生租借其他場地，留學生被逼無路，才有商借大使館做爲紀念會場之舉。其次，留學生選5月7日開紀念會，其來有自，遠因可追溯到1915年5月7日日本向中國提出最後通牒，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條約。換言之，對中國人而言，5月7日是被屈辱的日子，選這一天做紀念，當然有其歷史上的涵意，但絕不是針對日本皇太子而來，因此留學生的行爲，也不應被敵視爲故意挑釁。^⑩在吉野如此解釋下，此一衝突事件總算沒有繼續擴大，留學生也不再堅持集體返國之決定。^⑪反而，經此次事件，吉野願爲中日親善努力的誠意廣被留日學生肯定，奠定了他往後推動中日文化交流的基礎。

吉野邀請北京學運領袖赴日訪問之事，雖然因時機不當，無法立即實現，不過吉野對五四運動的見解以及對中日民間親善的期待等文章，經李大釗將其節譯，^⑫發表在中華新報、^⑬民國日報以後，^⑭卻獲得中國學子們巨大的回響。據吉野自敘，他收到許多素未謀面中國友人的來信，這些來信使他感到溫馨，也讓他有信心

⑤ 國民新聞，1919年5月8日。

⑥ 中村勝範，「『激動の時代』と黎明會」，法學研究，1989年4月，頁3，7。

⑦ 大阪朝日新聞，1919年5月29日。

⑧ 大阪每日新聞，1919年5月30日。

⑨ 大阪每日新聞，1919年5月15日。

⑩ 吉野作造，「日支相互の諒解」，黎明講演集第2卷第1輯（1919年9月），頁3-6。

⑪ 同註⑩。

⑫ 同註⑩，頁105-106。

⑬ 「日人吉野作造之中國最近風潮觀」，東方雜誌第16卷第7號（1919年7月），頁191-194。

⑭ 「吉野博士對我國最近風潮觀」，民國日報，1919年6月20日，6月21日。

更能堅持己見。那就是中國民眾絕無意與日本為敵，中國民眾所痛恨的僅限於本國的專制政府以及助紂為虐的日本政客，吉野所提倡的中日民間親善觀點，這些中國友人都能接受，而且也願意為達成這理念與吉野攜手合作奮鬥。⁶⁴全國學生聯合會致黎明會的公開信，可說是中國青年學子對吉野理念共鳴的最佳註腳。來信的內容如下：

此次敝國人民之愛國運動，貴邦人士之能諒解者，厥為貴會諸君子。貴會主幹吉野博士致敝國某君書曰：「我知貴國雖盛倡排日，所排之日，必為野心的、侵略的、軍國主義的日本，而非親善的、平和的、平民主義的日本。侵略的日本，不獨為貴國青年所排斥，抑亦我儕所反對者也。侵略的日本，行將瓦解；未來平和人道之日本，必可與貴國青年提携。」博士此語，我國人士實不勝其感佩之情。蓋此皆我國人士心坎中所欲發者。然貴國人士，猶有致疑于敝國此舉之室于怒而市于色者。彼謂持侵略政策者，為日本軍閥派政府，日本人民無與也。而中國之所抵制，乃連類及于人民也，是則不可以不辯。夫以抵制貴國政府，而使貴國人民受其損害，誠為遺憾。諸君試思敝國人民，內戴昏愚之政府，外逢侵略之政策，為自衛計，舍此更有何法。吾儕運動之目的，一則表顯人民之心理，鳴歷來秘密外交之不當，以促敝國政府之反省。一則表示國民之能力，借經濟上之打擊，以促貴國人士對於貴國政府之決心。諸君須知我中日兩國人民，本無深仇宿恨，徒以兩國軍閥政府之狼狽要結，遂致互相嫉視。苟一日不解脫此萬惡之軍閥，則兩國人民，永無親善之望。各欲解脫其軍閥政府，則非互助不可……貴會諸君，為社會之先覺，尚願振其道鐸，促貴國人民，當機立斷，根本剷除此二十世紀不祥產物之武斷主義、軍閥主義。敝國人民雖駑駘無似，願追其後塵，以共謀人類之真正幸福，而保東亞之平和。豈非中日兩國之幸耶，豈非黃色人種之幸耶。⁶⁵

從這封公開信可看出，雙方對五四運動的時代意義以及推展民主政治的理念上，並沒有本質上的隔閡，對吉野所倡導的加強雙方民間交流，並以此做基礎，雙方有志之士相互提攜共謀對抗兩國軍閥的號召，全國學生聯合會也寄以善意的回

⁶⁴ 同註⁶³，頁105-107。

⁶⁵ 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輯，五四愛國運動資料（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頁282。

應。

吉野的理想，在獲得中國青年學子的認同後，而呈現轉機。雖然對吉野的動機持懷疑態度者還是大有人在，認為吉野所提倡的中日親善活動，無非是拉攏人心，緩和中國民眾反日情緒的偽善伎倆。⁶⁶但高一涵及方豪等人組成的北京大學學生遊日團能毅然成行，也蘊涵著北京學術界對吉野的肯定。不過原來具名推動此項中日學術交流活動的黎明會，卻在高一涵等人來訪的前一個月，決議停止活動。⁶⁷黎明會的解散，⁶⁸象徵著日本自由民主學派的分裂，也說明了吉野在日本思想界的地位由盛而衰的一個轉折點。吉野所提倡的英美式民主思想，企圖以議會政治的方式來落實日本民主政治的想法，隨著威爾遜主義的破產，已不能贏取日本學術界的共鳴。⁶⁹講求直接抗衡的工團主義以及隨後興起的共產主義則先後成為日本學術界的主流。⁷⁰吉野在日本思想界影響力的日趨衰微，相對地也影響到他推動中日民間親善活動的實力。

北京大學學生遊日團在日本的行程，是由吉野本人及「新人會」負責。新人會成立於1918年12月，是以吉野門下的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為中心而組成的學生社團。此會成立的背景與黎明會相似，同樣是以擁護吉野來抗衡日本右翼軍國主義思想為成立的直接動因，新人會會員深信民主思想已成為世界潮流，鼓舞年輕學子投身政治改革工作以求早日落實日本民主政治，是該會的最終目標。⁷¹新人會的綱領有二：

- (1)我們將協調解放人類的世界文化趨勢的新時機，並致力於促進此一機運。
- (2)我們將從事現代日本合理的改造運動。⁷²

從以上綱領就可得知，新人會與黎明會的基本理念是非常類似的，然而在發展的過程中，黎明會仍以啟蒙活動為主旨，而新人會則逐漸傾向於講求組織羣眾，以參與政治實務為活動目標。⁷³新人會可謂開啟日本知識分子參與羣眾運動的先端。新人會成立之後，日本各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勞工運動都直接或間接與此會有

⁶⁶ 民國日報，1919年9月12日。

⁶⁷ 同註⁶⁵，頁11。

⁶⁸ 黎明會正式宣佈解散是在1920年8月。同註⁶⁶，頁3。

⁶⁹ 同註⁶⁷，頁36。

⁷⁰ 同註⁶⁷，頁32。

⁷¹ 中村勝範・酒井正文，「新人會成立の背景」，法學研究，1975年5月，頁91-96。

⁷² H・スミス著，松尾尊裕・森史子譯，新人會の研究：日本學生運動の源流（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78年），頁47。

⁷³ 同註⁶⁷，頁32。

關。例如 1919 年 2 月，東京都下各大學生為促進普選活動所發動的示威大遊行^⑭，以及 1919 年 8 月日本最大工會友愛會的改組，使友愛會從一協調勞資紛爭的互助會，一躍而成爲統籌日本全國各地罷工的大本營等等都與新人會成員的主導有密切的關係。^⑮此外，1926 年所興起的新興政黨，絕大部分的領袖都是出身於新人會。^⑯從以上所論及的新人會成立的綱領以及成立後會務推展的方向，可知新人會是吉野刻意培養的子弟兵，也是他推動日本政治改革的基本籌碼。由這角度來看，吉野安排新人會和他一起出面接待北京大學學生遊日團，當然有其涵意。尤其是黎明會面臨解散命運以後，新人會可謂是他推動中日文化交流最主要的支柱。

五、吉野的挫敗及影響

北京大學學生遊日團於 1920 年 5 月 5 日到達東京。依團員徐彥之的解說，他們此行的目的，一是宣傳，二是考察。宣傳是指將國內學生運動的真象介紹給日本友人。考察是意指研究日本的教育、社會現狀以及近日舉行的大選。^⑰此一團體總共在日本訪問一個月，於 6 月 5 日返國。行跡遍及東京、橫濱、京都、大阪、神戶等地。接洽的團體除新人會外，還有勞學會、建設者同盟、友愛會、六日俱樂部及東京、京都兩大帝國大學學生會等組織。^⑱這些都是不滿當時日本的政治專制體制，而以改革日本政治、經濟結構爲訴求的革新團體。例如勞學會是京都大學學生所組成的社團，在京都學運界居於主導的地位，以號召知識分子學習勞工問題爲宗旨。^⑲建設者同盟是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團體，成立的宗旨與新人會相似，但發展方向卻和新人會不同。新人會以組織都市勞工階級爲重點，建設者同盟則以關心農村爲號召，是日後日本農民運動的主幹。^⑳友愛會如前文已述是日本最大的工會。六日俱樂部是以關西地區的知識分子爲中心，以宣揚民本主義爲主旨的學術社團。^㉑而東京、京都兩帝國大學學生會可謂是代表日本關東、關西地區東西兩方校內學生組織的龍頭。這些團體都是日本新興改革勢力中最具代表性的菁英。吉野能將他們

^⑭ 赤松克麿，日本社會運動史（東京，岩波書店，1952年），頁166。

^⑮ 同上，頁159-162。又參閱中村勝範，「勞動運動における量と質」，法學研究，1989年12月，頁45-46。

^⑯ 同註②，頁24, 32。

^⑰ 日本第十四屆眾議院選舉於1920年5月10日舉行。民國日報，民國9年5月8日。

^⑱ 民國日報，民國9年6月11日。

^⑲ 同註⑲，頁37-38。

^⑳ 同註⑲，頁85-87。

^㉑ 松尾尊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研究，頁301。

匯集一堂成爲北大學生遊日團的交流對象，可見他對此次交流的重視，從這方面也可看出他強烈的企圖心。誠如他所說，他期待這是一個起點，藉由兩國青年學生的交流，進而締結一相互支援互相提携的合作關係，在這互助合作的關係上各爲兩國的民主化奮戰外，也能替代兩國的傳統官僚關係。^②

爲瞭解北大學生遊日團在日本活動的狀況，在此將他們的行程一一臚列如下：
5月7日出席東京地區的留日學生團聚會，^③

8日於下榻旅舍與新人會會員初步接洽，11日與新人會會員共進晚餐，席間並與吉野作造、新人會成員交換改革之道。^④

12日訪問東京新村支部，實地考察日本社會主義者所嘗試推展「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烏托邦式社會情況。^⑤

13日在東京帝國大學辯論部舉辦演說會，由康白情及方豪各以「大和魂」及「今日青年之責任」爲題發表演說。康白情寄望日本青年能將大和魂所強調的重名譽、尚廉恥、輕生死的美德發揮在追求爲全人類謀幸福的活動上，而非僅限於謀日本一國私利的活動。方豪則期待日本青年能理解當今世界的潮流已由國家主義演進爲世界主義，日本青年不應再沉迷於以往具有侵略性的軍國民教育，應致力於改善此種不合世界新潮流的舊教育。^⑥

16日參觀常寶博物院。

17日與吉野作造、新人會會員早阪二郎共同舉辦「中日學生聯合演說會」。遊日團方面由高一涵及方豪爲代表分別以「中日親善之障礙」及「中日學生提携」爲題演講。高一涵指陳中日親善之障礙有三，一爲帝國主義，二爲狹義的國家主義，三爲以中日親善爲手段，而企圖達成他種目的。而方豪則強調現今中日學生實處於同一難堪之境遇，即皆受軍閥官僚資本壓迫，我們如果想舉提携之實，唯有互相扶助；推倒貴族，推倒官僚，推倒軍閥、資本家、特殊階級。早阪二郎則以「國際生活更新之一大暗示」爲題，力陳今後外交當由政府之間的關係演變成爲國民之間的關係。吉野最後演說「日支親善於文化的意義」，強調中日不能親善應完全歸咎於日本之軍閥及財閥。^⑦ 17日的演說會，現場情緒高昂，高一涵對當前中日外交關係

② 吉野作造，「日支學生提携運動」，中央公論，1920年6月，頁46，50。

③ 民國日報，民國9年5月14日。又參閱東京朝日新聞，1920年5月8日。

④ 「新人會記事」，先驅，1920年6月，卷首語。

⑤ 同註④。

⑥ 同註④。

⑦ 同註④。

的批評，深入日本政府要害，爲此，日本外務省表示嚴重關切，特致函給東京大學法學部及經濟學部，表達日本政府不支持此項文化交流活動，也不希望此類交流活動持續下去。⁸⁸除此之外，日本政府還拘捕當日代表新人會出場演說的早阪二郎，以其演說內容中有褻瀆皇室爲由，將他以「不敬罪」起訴。雖然事後早阪僅遭拘留處分，未被起訴，⁸⁹但日本政府公然以行政手段對主辦者吉野以及新人會施加壓力之舉，卻阻嚇了日後中日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

5月19日遊日團按原訂計畫參觀早稻田大學，晚上與建設者同盟會聚餐。席間由建設者同盟會的指導教授北澤新次郎致歡迎詞，說明中日知識階級聯絡之必要。爾後由康白情演說「東亞之新建設與中日文化同盟」，略謂東亞之堪稱有爲之國家，僅中日兩國。兩國青年，既皆有改造世界之志願，而欲以新建設代替舊組織，則兩國青年爲排除有礙新建設之舊勢力起見，應該締結文化同盟。次由方豪演說「新人與新思想的關係」。謂世界思想已由政治的革命而傾於社會的革命，而秉持此新思想以實行改革者，則爲新人。早稻田大學片上伸教授接著以水爲喻，指出水遇冷則結冰，然其下仍爲水，今日中日兩國其上面雖結冰，而下面仍有活水，以此來表達他個人對中日民間親善的期待，最後由孟壽椿演說「最近中國思想之改革」，謂中國之思想由五四運動的結果而有所劇變；即由國家的而變爲世界的，由靜的變爲動的，由個人的而變爲社會的，由機械的變爲自覺的等等。⁹⁰

5月20日遊日團遊覽橫濱市。21日參觀日本女子大學。22日參加東京帝國大學青年會所舉辦的晚宴，席間由方豪及康白情代表致辭。方豪表達來日之目的，康白情則解釋中國學生排日的原因。24、25兩日遊覽日光。

5月29日起遊日團正式展開在日本關西的行程，當天早上拜訪京都帝國大學，下午則參加京都同志社大學所舉辦的歡迎會。同志社的歡迎會是由校長海老名彈正親自主持，他表示創造性的事業，端賴青年。今中國青年欲創造新中國，而日本青年亦欲創造新日本，兩國青年須相互了解，共同努力。方豪代表致答辭，爾後由康白情演說「世界和平與吾人使命」。他指出目前中日兩國之現勢，實有戰爭之可能，中日兩國青年實有莫大責任，如欲消弭將來的兵禍，唯有打倒帝國主義。⁹¹

5月30日遊日團參加六日俱樂部主辦的歡迎會，此一歡迎會集合了關西地區主

⁸⁸ 民國日報，民國9年6月3日。

⁸⁹ 民國日報，民國9年6月13日。又參閱伊藤隆，大正期「革新」派の成立，頁，24。

⁹⁰ 同註⁸⁹。

⁹¹ 民國日報，民國9年6月13日。

張民本主義的知識分子、勞學會的京都大學學生、友愛會、織友會等勞工團體的幹部，以及在當地就讀的中國留學生及朝鮮籍同學。每日新聞記者西川百子致歡迎詞後，由京都大學教授戶田海市演說「社會主義運動」。戶田表示社會主義的真意，不僅是求物質的公平化，也求智識的平均化。爾後社會主義努力的方向應是致力於提昇全國民眾的教育水準。遊日團是由康白情代表，演說「中國的社會改造」。介紹中國近日推展社會改造運動的目的及現階段推展的實況，其中尤對五四時期杯葛日貨運動的意義加以說明，指陳這是中國民眾對日本帝國主義政策的反擊，是促使日本資產階級反省的不得已手段。京都大學教授末廣重雄接著演說「中日提携的根本意義」。表示近日日本資本家已無人再持侵略思想，再加以今日日本青年都信仰民本主義、和平主義，相信今後兩國青年必能攜手合作，為敦睦兩國邦交而努力。^⑳

5月31日遊日團遊琵琶湖，而團員之一的徐彥之則單獨去拜訪日本馬克思主義大師河上肇（京都帝國大學教授）。6月1日往大阪參觀朝日新聞館，2日參觀大阪市民博物館，4日往神戶參觀貧民窟。5日則整裝回國。^㉑

按吉野的原預定計畫，遊日團來訪只是第一步，日本方面再擇期回訪則是第二步。但不料在遊日團訪問的途中，日本外務省突然對東京帝國大學發出以下通牒，「北京大學教授高氏等人來日訪問，而東京帝國大學秉持交換演講之精神，也有意派遣教授赴華回訪，如此等傳聞屬實，將不利於中日兩國邦交，明令中止」。^㉒同時，日本政府也對日本各大學發出通令，要求各大學禁止學生利用暑假期間到中國從事學術交流。^㉓在日本政府有計畫的打壓下，吉野的中日學術交流計畫也只有半途而廢，空留遺憾。

從以上的論述得知，吉野所推動的中日學術文化交流，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以來，中國民眾普遍性的仇日聲中，推動兩國有志之士日趨親善的一大契機。這個機會被日本政府扼殺了。自此，中日兩國學界也自成陌路，再無交集點了。松尾尊兌在檢討這段歷史時，曾感言為何吉野開闢了中日友好之路，後繼卻無人。他將這原因歸諸於日本知識分子不重視中國，不省思日本的侵華政策，也不認定中日兩國在民主政治的推展上有互動關係。^㉔環顧事實，此的確為持平之論。換言之，中

^⑳ 同上。又參閱松尾尊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研究，頁301-302。

^㉑ 同註⑳。

^㉒ 大阪毎日新聞，1920年5月29日。

^㉓ 同註㉒，頁46。

^㉔ 松尾尊兌，大正デモクラシーの研究，頁303-306。

日青年學子之間的交流，雖然在吉野熱心的鼓動下，而得以實現，但兩國青年學子之間在首次的交會中並沒有達到思想的交集，才是雙方交流無法持續的主因，日本政府所代表的外在壓力不應斷言為問題的癥結。個中緣由，則還需從吉野的理念以及當時新人會的想法，加以探討。

吉野推動中日文化交流的熱誠是來自中國五四運動的刺激。吉野認為五四運動是代表著中國青年學子的覺醒，這份覺醒反映到五四運動上則有兩方面含意，一是對抗外在的侵略主義，另一卻是排斥中國的專制政治。這對主張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也正為其祖國的民主化催生而奮戰的吉野而言，見到中國青年對民主政治的訴求，除感到欣喜之外，更認為這是雙方合作的基礎。對於五四運動中所包含的反日情緒，吉野則認為這是日本軍閥政府的侵略政治所引發的後果。他鑑於日本民眾並未參與政府侵華外交政策上的作業，也未享受到侵略的果實，認為日本民眾不需擔負日本政府的侵略惡名。因此，吉野有兩個日本的說法，一是指代表日本政府的「侵略日本」，另一是指代表民眾的「和平日本」。^⑦言外之意，縱然有侵略的日本先去中國為非做歹，但也不妨礙後來居上的和平的日本與中國民眾親善。吉野提倡此說法，無非是想消除日本民眾對中國民眾反日的疑慮，不希望兩國民眾陷於情緒上的對抗，也期待日本民眾能勇於伸出雙手向中國民眾表達善意。換言之，吉野並無意利用此說法，來掩飾日本政府侵華的罪行，此事可從他一再撰文呼籲日本民眾要拿出「良心」來牽制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上得到證實。^⑧不過，他為了去除日本民眾心中的障礙而提出來的「侵略日本」、「和平日本」之說，傳播到新人會會員時，卻成為他們的護身符，新人會會員也藉由吉野的此一說法，完全擺脫了做為一侵略國國民應有的自覺。1920年6月新人會為了歡迎北京大學學生遊日團，特地在其會刊上撰寫的社論，就是這種心態的最真實反映。

這篇題為「歡迎民國來的友人」的社論，全文是這樣的：

五月初能接待您等遠來的同志，對吾輩同學、對兩國文化運動的未來前途而言，皆是何等高興之事。雖然吾輩與您等是初次謀面，但很久以前就對您等主張深感共鳴，對您等奮鬥目標心存敬意。目睹北京東交民巷及各地租界所展現出列強的蠻橫，北京城牆、上海公園、青島海水浴場等地貴國人民所遭受的辱凌時，若有一點良心者誰能不憎恨列強的政策。吾輩從來就對敵國飽

^⑦ 吉野作造，「北京大學學生團の行動を漫罵する勿れ」，卷首語。

^⑧ 吉野作造，「支那・朝鮮の排日と我國民の反省」，婦人公論，1919年8月，頁26。又參閱吉野作造，「對外的良心の發揮」，中央公論，1919年4月，頁101-104，109-110。

受虐待的無產階級深感不平，對資本家的蠻橫持批評的態度。今日睹貴國深受列強迫害的現狀，也同感義憤。在內是貪得無厭的資本主義，出外就變成是殘暴無極的侵略主義，此兩主義，基本上是一體兩面。本來應相互扶持之人，結果變成相互爭奪，本來應相互提携之國，結果兵戎相見，這些都因存在著上述不合理的現象所使然。如果此等不合理現象繼續存在，人類永無追求和平的日子，自由人的世界也無法實現，吾輩深信您等奮鬥的目標就是邁向人類的理想國度，對此奮鬥目標吾輩深表認同。也認定此等努力與吾輩為反特權階級而從事的各種無產階級活動具有同等意義，對此，吾輩也深感敬佩。但橫阻吾等目標之力量卻是異常頑強，對此吾等不得不先有覺悟，他們想必也將集數十年的累積力量與吾等決戰。……同志們，讓我們攜手並進吧！爲了建設自由的中國及日本，爲了創造人類的新文化，即使身爲人柱不是也應在所不惜嗎？⁹⁹（人柱是日造漢字，意指古時造橋，爲求順利完工，常用活人做橋墩，意即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從這篇社論可看出，新人會是以社會主義同好的態度，來接待北京大學學生遊日團的。在新人會以社會主義思想的角度來肯定雙方所從事的運動之際，卻忽視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也是中國學生奮鬥的主要目標之一。換言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既是中國當時學運的具體目標，而新人會卻對此毫無共識，雙方之間已喪失合作的基礎。在雙方的交流過程中，缺乏實質凝集點的情況下，再加上日本政府的壓力，以及推動整個活動的靈魂人物吉野作造在日本學術界影響力日趨衰微的外在環境，中日文化交流的活動最後變成曇花一現，這並不是偶然所促成的。

吉野推動中日文化交流的無力感，除上述原因外，與日本國內的現實政治環境，也大有關係。1925年3月30日，日本眾議院通過普通選舉法，新的選舉法取消了財產限制，使每一位年滿二十五歲的男子都有投票權。新的制度實施後，選民人數從原有的三百三十四萬人一下擴增爲一千四百一十五萬人。¹⁰⁰選民人數如此大幅增加，當然也提供政黨政治有更大的擴展空間。

1926年所掀起的組黨熱潮，基本上就是反映此一事實。新興的政黨中，以社會民眾黨、日本勞農黨、勞働農民黨最具羣眾基礎，又能晉身國會，¹⁰¹而引人注目。

⁹⁹ 同註⁹⁴，頁1。

¹⁰⁰ 中村勝範，「第一回普通選舉と無產政黨」，法學研究，1962年8月，頁33。

¹⁰¹ 根據普通選舉法所實施的第一屆眾議院選舉（1928年2月20日），社會民眾黨當選四席，勞働農民黨二席，日本勞農黨一席。

這三個政黨的核心成員都是出身於新人會，^⑫也都以社會主義政黨自居，但卻有不同的政治理念。社會民眾黨以右傾作號召，主張在議會政治的基礎上實施社會主義政策。^⑬勞働農民黨是日本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代表左傾勢力，競身合法組織，參與選舉只是培植勢力，培養幹部的第一步，其最終綱領還是主張武力革命。^⑭日本勞農黨則以中道自居，企圖以中間路線來鞏固原有的組織基礎。^⑮

社會主義政黨相繼成立，新人會的前後期成員各參與其事，此一事實除反映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思想分歧外，也意味著吉野影響力的低落。這對從 1916 年起鼓吹民本主義，期待普選的實施，改造日本政治結構，作為放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契機的吉野而言，無力統合併隨普選實施而來的新興政黨，無疑的表示吉野已無主導日本改革派思想的能力。面對著共產主義在學術界、勞工界的勢力抬頭，吉野不得不挺身而出，親身參與社會民眾黨的建黨工作，這些事實的演變，^⑯也反映出吉野已喪失作為一個改革派思想大師的領導地位，他的影響力也成為侷限在他所創建的社會民眾黨。

社會民眾黨成立於 1926 年 12 月 5 日。成立初期，對中國政策上頗能遵循吉野的中日親善理念，在民國政府北伐期間，屢次公然聲援中國革命，對日本政府的山東出兵政策也持反對立場。^⑰不過，九一八事變以後，鑑於軍部勢力抬頭，日本國內民族主義氣息高漲，社會民眾黨竟有與日本右翼軍人合作之議，主其事者是新人會的早期成員，也是吉野的女婿赤松克磨，時任書記長^⑱。為此，吉野深感不齒，特於 1932 年 1 月發表「民族與階級與戰爭」一文，指責社會民眾黨坐視九一八事變的不義，針對赤松克磨所提倡的國家社會主義，認為出兵中國東北是維護日本權益，是確保日本民族生存的必要之舉等論調，吉野除表示懷疑之外，也以「即使再渴，也不應偷飲盜泉」的古訓來告誡日本全國國民。認為日本國民不應因垂涎

^⑫ 舉例言之，社會民眾黨方面有赤松克磨（中央執行委員，書記長），宮崎龍介（中央委員）。日本勞農黨有三輪壽壯（書記長）、麻生久（中央執行委員），棚橋小虎（中央委員）。勞働農民黨有細迫兼光（書記長），黑田壽男（中央執行委員）等等。

^⑬ 中村勝範，「社會民眾黨の中國國民革命への對應：南京政府成立まで」，法學研究，（1976年7月），頁1。

^⑭ 同註^⑬，頁41。又參閱吉野作造，日本無產政黨論，附學生と思想犯（東京，みすず書房，1988年），頁52-53。

^⑮ 同註^⑬，頁230-235。

^⑯ 同註^⑬，頁221-222。

^⑰ 同註^⑬，頁3-29。又參閱田中惣五郎，吉野作造（東京，三一書房，1971年），頁287-289。

^⑱ 赤松於1922年娶吉野次女明子為妻。田中惣五郎，吉野作造，頁337-342。

中國東北的物資資源而罔顧正義，轉而支持政府的侵華政策。^⑩但，顯然的，日本國民並沒有聽從他的勸告。吉野逝世於翌年（1933），他生前的努力並不能阻擋日本舉國一致的侵華浪潮，他對培養過的學生，曾寄以厚望，然而個個卻離他而去。環顧史實追溯原因，主要的環結並不是在於大家對理論的認同不一，而是在於眾人沒有這份道德上的執著與深思。即使再渴，是否可偷飲盜泉等的價值判斷，才是吉野與他的學生，新人會成員們的分歧點。但這個分歧，並不是始自九一八事變，而是早在新人會成立初期，在新人會成員與北京大學學生遊日團交流之際，即已露出端倪。

六、結 論

促成吉野推動中日文化交流的兩大要因，一是威爾遜主義在全世界的興起，二是五四運動的發生。威爾遜主義在全世界所掀起的民主浪潮，使吉野深信民主政治已成爲當代政治思潮的主流，日本立國的方針應定位於對內勵行民主政治，對外推展國際民主政治。五四運動在中國的發生，證實了威爾遜主義已在中國萌芽，使吉野欣見中國學子追求政治民主之餘，更加深了他推展國際民主政治的信念。北京大學學生遊日團的訪日，成爲他推動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步。他期待藉由雙方學術界及年輕學子們的互訪，能使雙方改革派勢力建立一個相互提携，共謀兩國民主化的友好關係。

日本政府的明文禁止雙方的文化交流，是吉野計畫功敗垂成的外在因素之一，但雙方的交流沒有共識的基礎，才是問題的核心。換言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既然是當時中國學運的具體目標，而吉野所培養的新人會對此卻毫無反省，在日本改革派不認同中國民眾的反日帝國主義思想情況下，雙方已喪失合作的基礎，這才是吉野推動中日文化交流失敗的主要原因。

^⑩ 吉野作造，「民族と階級と戦争」，中央公論，1932年1月，頁32-38。